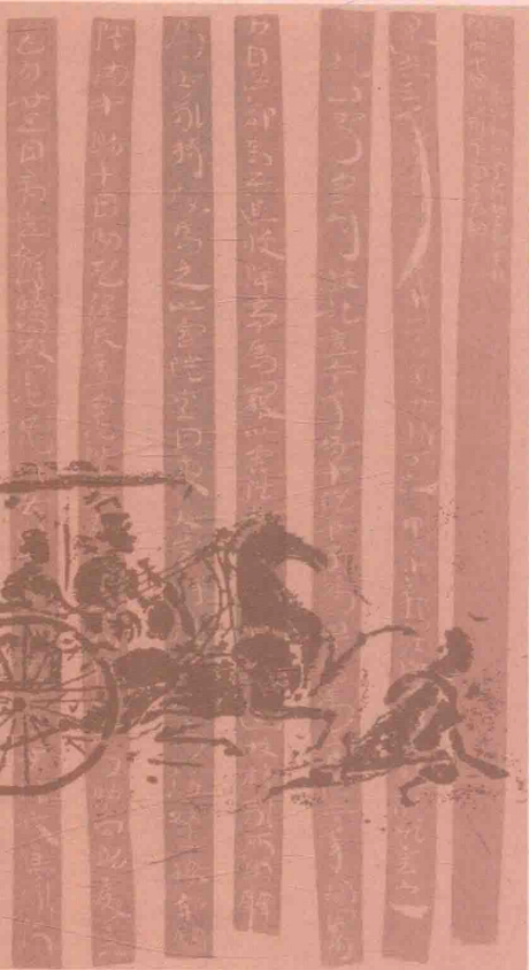


公羊学天人思想 与西汉文学的经学旨趣

◎ 韩维志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0CZW019）结项成果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出版基金全额资助

公羊学天人思想 与西汉文学的经学旨趣

◎韩维志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羊学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的经学旨趣/韩维志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622-8249-5

I. ①公… II. ①韩… III. ①《公羊传》—研究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西汉时代 IV. ①K225.04 ②I206.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110026号

公羊学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的经学旨趣

© 韩维志 著

责任编辑: 魏耀武

责任校对: 肖绪旭

封面设计: 罗明波

编辑室: 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 027-67867792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

电话: 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邮编: 430079

网址: <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邮箱: 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督印: 王兴平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230千字

版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6

定价: 49.00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作者简介

韩维志，1971年生，辽宁营口人。1991年—2001年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分别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2年—2004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有《上古文学中君臣事象之研究》、《察举制度与两汉文学关系之研究》等专著。主要研究领域为汉代文学与汉代文化。

内 容 提 要

西汉一代二百年的学术领域，除了汉初施行黄老无为之术，武帝以后一直是儒学的天下。而在儒学内部，《春秋》最尊，春秋学内部，则是今文公羊学一家独大。天人学说是公羊学的核心思想，本书对它如何作用于汉代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风士风进行了初步探讨。

目 录

引论：《春秋》公羊学在西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优势地位·····	(1)
第一章 公羊派学说影响西汉政治·····	(18)
第一节 儒学在西汉政坛的初胜·····	(18)
第二节 《春秋》公羊学对西汉政治的影响·····	(33)
第二章 董仲舒的天人之说·····	(53)
第一节 天与人的感应互动·····	(54)
第二节 人间政治取法天道·····	(77)
第三章 公羊派天人学说的文论内涵·····	(95)
第一节 董仲舒的经学化文论·····	(95)
第二节 权威崇拜与经典崇拜·····	(106)
第四章 公羊学天人思想影响下的西汉文学创作·····	(127)
第一节 结构与写作技法所受的影响·····	(127)
第二节 祥瑞与灾异主题的书写·····	(148)
第五章 公羊学天人思想与西汉文风的转型·····	(169)
第一节 功利性的文风·····	(170)

● 公羊学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的经学旨趣

第二节 学术化的文风	(183)
第六章 公羊学天人思想对西汉文士心态的影响	(201)
第一节 颂美与批评的抉择	(203)
第二节 崇道与从势的纠结	(227)
参考文献	(238)
致谢	(252)

引论：《春秋》公羊学在西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优势地位

一 《春秋》经

先秦时期，各国记载本国历史的书籍除了少数例外，皆以“春秋”为名^①。例如，叔向“习于《春秋》”所指乃是晋国的《春秋》；晋国大夫出访鲁国，观书于太史氏，曾见鲁《春秋》；申叔时就楚庄王太子的教育内容而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所指当为楚国的本国史；《墨子》更是详细列举各诸侯国之有《春秋》者，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战国策》记乐毅之语，谓贤德君主将为后世所铭记而“著于《春秋》”；等等^②。

之所以列国皆有《春秋》，主要原因是上古时期华夏“史”意识的发达。班固《汉书·艺文志》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其职责为“君举必书”，即详尽记录君王的一言一行，目的是令君王“慎言行”，从

① 《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晋之《乘》与楚之《梼杌》今皆失传。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史书名为《梼杌》，与周文化圈诸国史书名称明显有别。而晋国的史书，既有名“乘”者，又有名“春秋”者，稍为杂乱。

② 分别见《国语·晋语七》、《左传·昭公二年》、《国语·楚语上》、《墨子·明鬼下》、《战国策·燕策二》。

而为臣下树立法式典范。班固谓王者身边的史官有左史与右史两位，且专职不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最后的成果是“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较班固稍早的成于西汉的《礼记·玉藻篇》也称说古之王者身边有左右二史，但对二史职能的界定却迥异于《汉志》：“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到底左史、右史哪个负责记言，哪个负责记事，倒不必过分纠缠。因为上古时期的作者记载错乱、好为大言，是很常见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古人重视过去，关注当下，重视鉴往以知来，这就是“史”的意识发达的明证。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①前人多有怀疑孟子此说的可靠性，但翻检史书，可以印证孟子此说的史例确实不少。宋国上卿华督弑殇公，虽然已经过去了几代，华督的后人还是深以为耻，谓“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宁武子将国君驱逐出国，一直到死都耿耿于怀，谓“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宁武子因此而要求儿子答允在自己死后将流亡的国君迎请回国^②。华氏和宁武子的憾恨，是一旦被记录进列国《春秋》，将永远背上骂名而传之万代。由此可见，史书的警策作用是很强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令乱臣贼子惧”的震慑作用。

先秦各诸侯国都有自己本国的《春秋》，但今天可见的，却只有一种鲁国的历史记录。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伴随着封建诸侯的政策实施，强大侯国兼并弱小侯国的进程就已经开始了。当西周分封之初，诸侯国有数百个之多。但出现在鲁《春秋》中的侯国，却不过数十个；两个半世纪过后，到了春秋末期，仅仅剩下寥寥十余个侯国；战国时期，剩下七个大国；到了最后，完全被秦吞并。一旦一个国家被灭掉，首当其冲被殃及的，就是被灭国家的历史记录，这种情况，可以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述秦灭六国的进程找到例证。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事分别见《左传》文公十五年、襄公十五年。

其次，鲁国虽也在战国初年被楚国灭亡，但鲁国的《春秋》却因一个原因摆脱了湮灭的宿命，那就是鲁国儒生的传习。鲁地是儒学最大的根据地，是孔孟的故乡，有着深厚的传统儒学背景，有着众多的儒学典籍研究者。从孔子开始，鲁《春秋》就是先生教学的课本，司马迁《史记》称“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①。孔子毕生对政治的理想都倾注在这部万余言的《春秋》里，他“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绝对不自作主张，但在编定《春秋》时，即便是自己最得意的“文学”科的高足子夏等人，这次也不允许在旁襄助，孔子对此书的看重可见一斑，《春秋》因而成为五经之中夫子最看重的一部。因此，后代儒生对此书的重视程度也超乎其他四经之上——尤其在西汉，《春秋》经是传习人数最多的一部。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众多国家的《春秋》都渐灭了，而鲁国这一小国的历史记录却最后保存了下来，成为仅存的硕果。

《春秋》记事，并非事无巨细地一一记录，而是采取一种较为简略的粗线条记事，即仅记大事件的编年史。它的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春，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计鲁国十二公242年间的历史大事。虽然这是鲁国的史书，但该书记事不仅仅局限于鲁国一地，只要是与鲁国发生关系，远至秦楚甚而蛮夷史事也予收录。因而，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它的记事方式，我们可以以开篇的“隐公元年”这一年的记事为例来加以考察：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① 《史记·孔子世家》。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子益师卒。

首先，就记事的第一要素时间而言，不是每条经文都有精准的时间；其次，不是所有的经文都有内容，例如第一条即是；再次，因为主语或宾语的缺失，有时候会产生歧义，比如第五条经文，无主语，结盟的对象也模模糊糊地以“宋人”带过，这就影响了记事的准确性。尽管如此，这简洁的七条经文，既有鲁国的内部事务或与他国的外交事务，也有发生在鲁国国境外的战事，将公元前 722 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一一记录在册，体现了恢宏的全景意识。其他年份的记录，或繁或简，视情况需要而采取灵活的记录方式，将作者所理解的“国之大事”，举凡战争、会盟、内政、外交，以及周天子、各国诸侯的生卒、婚媾、祭祀、交往，一股脑地收录其中。简单地说，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本是记载春秋时期包括鲁国在内的各国历史大事的编年史。这些史事，包括各国间的战争、会盟、内政、外交等大事件，以及各国诸侯的生卒、婚嫁、祭祀、朝聘等细事，巨细无遗地记录了近两个半世纪的以鲁国为中心的华夏的“世界史”。

二 《春秋》经今古文之争

就大的学术环境而言，西汉二百年的学坛，泾渭分明地分为经古文学和经今文学两大对立阵营。

西汉学坛，基本上是今文经的天下。今文，乃是与古文相对而言，它指的是西汉通行的书写文字——汉隶；古文，则指与西汉通行的汉隶相对而言的已经基本无人使用的前代古老文字——小篆和大篆。秦帝国之前，战国七雄每个国家的文字都不同，但基本上都属于篆文。秦帝国是中国文字演进历程中极重要的一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简省文字已是大势所趋，篆文因其书写不便而遭淘汰，相对简便的隶书渐渐普及。秦帝国实行焚书坑儒的反文化政策，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

先秦古书多被禁止传播。秦帝国短祚，西汉兴起，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承续秦制。高祖建立西汉，不改敌视文化的政策，突出表现即一直未废秦制定的“挟书律”。直到惠帝时，才取消该法律，并面向全国收集图书。于是，儒家师生间的学术授受才重趋活跃。惠帝废除“挟书律”，标示汉帝国开始重视文化，儒生纷纷用当时通行的汉隶来将原本师徒口耳相传的经典文本记录下来，是之谓今文经。《周易》的田何本，《尚书》的伏生本，《诗经》的齐、鲁、韩三家传本，《礼》的高唐生本，《春秋》的公羊家传本，都是如此。

而所谓“古文经”，则是以隶书以前的篆文书写的经书文本。据《史记》所载，汉初惠帝之后，古文本儒家经典就渐渐出现，如河间献王刘德喜好学术，鼓励士子献书，他所收集到的“皆古文先秦旧书”。此外，孔子旧宅所出的古文经典也很可观，据《汉书·艺文志》，当武帝末年时，鲁恭王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而拆毁相邻的孔子旧宅，在拆除过程中得到了“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这些以古字书写的经典，从常理上说，应该比后起的用汉隶书写的经典去古更近也更可靠。但考虑到先秦两汉时期学者喜好托古以自重，甚至伪造古书而冠以古圣先贤之名的事实，则所谓的“古文经”是否真为先秦人所作，大可怀疑。今文经的拥护者就坚决指称古文经造假，因而不可信据。事实上，那些收集来的古文经典，也都被官方藏在“秘府”，一般学者甚至完全不知道这些书的存在，在汉哀帝以前，古文经都未被官方承认，未被立为官学，只能在民间流传。

经典文本的歧异，是两派最初也最明显的区别所在。五经中的每一种经，都存在文字、篇目的不同。据《汉书·艺文志》，元、成时，刘向“以中古文《易经》”和当时通行的今文《易》三家施雠、孟喜、梁丘贺文本，发现三家或脱去“无咎”、“悔亡”等语，唯有古文派的费氏文本“与古文同”；孔安国以得自孔壁的古文《尚书》比对今文伏生二十九篇本，发现多出十六篇；《诗经》的今文三家本与古文毛诗本，既有文字的不同，也存在解说的分歧；《仪礼》的今古文本，存在篇目的不同；《春秋》古文派的《左氏传》与今文派的《公羊传》、《谷

梁传》(按:《谷梁传》的归类问题,一向有争议,笔者倾向于将之归入今文经学门类)相比,差别最大,这里面既有经文的不同,也有三传解释方式的不同,详见下文,兹不具述。

在西汉,今文经与古文经水火不容,门派成见极深。古文经学曾经努力过几次,但都被今文经学打压下去,始终不得列为官学。哀帝时刘歆的出现,正式揭开了今古文经学剧斗的序幕。在刘歆生活的哀帝时期,今文经学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正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言:“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班固在这里批评的,就是西汉二百年中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这些虽然尖刻但却一针见血的评论,正道出了今文经学繁琐恒钉、固步自封、渐趋僵化的大弊病。今文经学积弊丛生的时候,正是古文经学揭竿而起的好机会。雅好古文的刘歆于是努力游说哀帝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为官学,并著《移书让太常博士》,批评经文经学家“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①。刘歆代表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宣战,终于在平帝时,借助于辅政的大司马王莽的力量,将古文《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于学官。古文经学的胜利,不是纯粹的学术胜利,它是借助于政治的干预而得胜的,还是要依赖政治力量的保护才能得以生存。

^① 《汉书·楚元王传》。

关于西汉经今古文之争，皮锡瑞、廖平和周予同三位的研究成就和影响最大。皮氏成果主要见于其《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二书；廖氏成果主要有四部著作，即《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今古学考》、《经话》和《知圣篇》；周先生的成果，被朱维铮收入《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相较而言，皮氏、廖氏左袒今文，难免今文经学迂曲怪诞的老毛病，且对古文经学的评价不很客观；而周先生却能抛却今文、古文的门派之见，立场中立，立论公允，因而成就最大。汉代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观点的对立冲突，廖平《今古学考》中的《今古学宗旨不同表》做了较为详尽的总结。周予同先生根据廖氏成说，选择去取，将之归纳为十三条，较为精当：

经今文学：

- (1) 崇奉对象为孔子；
- (2) 尊孔子为受命的素王；
- (3) 认定孔子是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 (4) 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
- (5) 认为孔子作六经；
- (6) 以《春秋公羊传》为主；
- (7) 为经学派；
- (8) 经的传授多可考；
- (9) 西汉都立于官学；
- (10) 盛行于西汉；
- (11) 斥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之作；
- (12) 今存《仪礼》、《公羊》、《谷梁》(?)、《小戴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
- (13) 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所存。

经古文学：

- (1) 崇奉对象为周公；
- (2) 尊孔子为先师；
- (3) 认定孔子是史学家；

- (4) 认为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
- (5) 认为六经是古代史料；
- (6) 以《周礼》为主；
- (7) 为史学派；
- (8) 经的传授不大可考；
- (9) 西汉多行于民间；
- (10) 盛行于东汉；
- (11) 斥今文经传是秦火残缺之余；
- (12) 今存《毛诗》、《周礼》、《左传》；
- (13) 斥纬书为诬妄。^①

周先生之后，当代学者陈筱为廖氏翻案，以为“廖氏许多重要结论，也在从简中被（周氏）有意无意地省略了”。通过比对，陈筱认为，《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列义项 33 个，其中较为重要而又为周氏省略的有以下几项^②：

今文	古文
《王制》为主	《周礼》为主
主因革	主从周
始于鲁人，齐附之	成于燕赵人
意同庄、墨	意同史佚
学近于王	学师乎伯
由乡土分异派	因经分异派
礼少，所无皆同古礼	礼多，所多皆同今学
所改皆周制流弊	所传多礼家节目
经唯《王制》无古学	经唯《周礼》无今说

①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 页。

② 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2 页。

综合周氏十三条和孙籥所补九条，经今古文的区别，大致如此。

而在经今文学内部，占优势地位的是《春秋》经。

《春秋》以万言而记两个半世纪的“世界史”，记事必然追求极度的简洁，这样，普通读者阅读该书，势必茫然无头绪。宋人说《春秋》是“断烂朝报”也许过分，但说它是报纸标题则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人能仅从报纸标题来获取太多信息的。于是，为这部太过于简洁的著作注解训释，也就渐渐成为必要，“传”于是应运而生。解释《春秋》的传，在先秦时代应有多种，但传至西汉，却只剩下五种，即《汉书·艺文志》所记录的《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据班固谓：五者之中，“邹氏无师”，即在西汉时期已无传授大师；“夹氏未有书”，即在西汉时期没有形成固定文本。如此说来，西汉初期传《春秋》的学派，应是唯有左氏、公羊和谷梁三家。其实，实际的情况比班固的论断要复杂得多。据《汉书·王吉传》，王吉就是治《邹氏春秋》的大家，而他是西汉后期人。亦即从西汉初期一直到西汉后期，《邹氏春秋》一直有传人，而非如班固所言“邹氏无师”。再看另外一条文献资料。《后汉书·范升传》记范升上奏光武帝的反对立《左氏》的表章，谈到了东汉初五经各家废立的情况，称：“（《易》）《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邹》、《夹》。如令《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邹》、《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因此，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的“《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文下注谓：“后汉时《邹》、《夹》私学犹存，其后乃尽亡耳。”《邹氏》和《夹氏》既然在东汉初期仍顽强存活并一再努力立于学官以与《公羊》、《谷梁》、《左氏》抗衡，则可以想见在西汉二百年时间里，它们一定也做过类似的努力，但缺乏有力的大师如《左氏》之刘歆，所以越来越不为人所注意，而终于烟消云散归于沦亡。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于十一卷的《公羊传》，自注作者是“公羊子，齐人”，并未明言公羊子的名。颜师古注引纬书《春秋纬说题辞》称公羊子名“高”。前人不言名高而后人却可以历历凿凿自信

如此，这颇引起学者的怀疑，更何况颜师古所征引的乃是可靠性存疑的纬书。至于该学派的传承，西汉学者也未明言，倒是后汉戴宏言之凿凿：“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① 子夏是春秋末年人，春秋末年至汉景帝时，约三百年。子夏五传至公羊寿，历经三百年，显然不可能，无怪乎崔适对此传承关系要怀疑了：“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② 其实，考虑到汉人为了自我神化而附会先圣的惯用伎俩，则可不必纠结三百年五传的谎话。此外，现存《公羊传》的正文中，屡屡出现诸如“子高子曰”（详见《公羊传》的“文公四年”传文）、“子鲁子曰”（详见《公羊传》的“庄公三年”、“庄公廿三年”、“僖公五年”、“僖公十九年”、“僖公廿四年”、“僖公廿八年”传文）、“子北宫子曰”（详见《公羊传》的“哀公四年”传文）、“子司马子曰”（详见《公羊传》的“庄公三年”传文）、“子女子曰”（详见《公羊传》的“闵公元年”的传文）、“子沈子曰”（详见《公羊传》的“隐公十一年”、“庄公十一年”、“定公元年”的传文）等等的言说，可以推断发表这些意见的学者，当是传授公羊学给弟子的经学大师，他们当是三百年学术传承过程中的一些较为突出的经师，至于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经师，应当更多。那么是否可以断言说《公羊传》的主体是“公羊子”所作？也不可以。《公羊传》的“桓公六年”和“宣公五年”传文，有“子公羊子”的论说。如此说来，“公羊子”当和上述高子、鲁子、北宫子、司马子、女子、沈子等一样，都是该学派传承过程中的经师，公羊子对该学派的贡献绝非决定性主导性的，仅此而已。因此，说三百年五传是不对的，戴宏提到的这五位，也许仅仅是传承过程中贡献最突出的五位罢了。

戴宏说“寿乃与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可见胡毋子都之前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词条。

② 崔适：《春秋复始》卷一，沈阳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